理论研究

时代主题与时代本质

邓小平创造性地从“时代主题”与“时代本质”两个角度来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时代，既肯定当今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又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逆转”，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肖　枫

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的科学论断，是包括“时代的主题”与“时代的本质”两个基本问题在内的完整体系，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和统一起来，才能全面完整地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时代。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全面把握邓小平时代问题论断的完整性

“时代的主题”与“时代的本质”，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分步解决并提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扭转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老观念，使全党能集中精力搞建设。可以说这就解决了“时代的主题”问题。20世纪90年代针对苏东剧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消亡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不可逆转”，坚定了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决心。这样又解决了“时代的本质”问题。将这两方面的概念结合和统一起来，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问题的论断就全面而完整了。概而言之，就是时代的主题转换了，但时代的本质没有变，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了，但时代的本质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根据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这一科学论断，我们必须从时代的高度处理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关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又必须抓住、抓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时，决不可忽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不迷失大方向。在谈坚持这些时，又要摆脱“战争与革命”年代陈旧观念的束缚，把握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特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因为这是当前实现理想信念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重视“时代主题”与“时代本质”的结合和统一

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主题与时代本质的论断，已成为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今时代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只有将二者结合和统一起来，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时代。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有充分理由和客观依据的。

首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这已是我们党的文件的规范性提法，获得了全党的共识。邓小平首次提出此问题是在1985年。当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是这么说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提出后，学术界就有人据此提出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说法，甚至有不少以此为标题的专著出版，这显然有所误解。因为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并未上升到“时代”。后来邓小平又强调“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就进一步说明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问题”，而绝不是指当今世界已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说，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自那时以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已成为党的文件中的规范性提法。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报告仍然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这说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提法已获得了全党共识。

其次，邓小平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社会主义“消亡论”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不可逆转”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当今“时代的本质”。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依然存在，但在时代问题中对此应如何认识和表述是值得研究的。曾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竞争的时代，因为会给人以两大阵营仍左右世界的错觉而被多数学者否定。近年又有论者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更不会有多少人响应。世界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复杂得很，“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并非总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心问题”或“主要问题”，整个世界的形势并不是由它来支配和左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是由两种制度的矛盾引起的，战后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冷战后世界向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方向发展，以科技为先导，以增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益激烈，这一斗争主要不表现为和取决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因此不宜将“两种制度”间的矛盾当成世界的主要矛盾来看待和处理，不能将世界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国际斗争都集中到“两种制度”的斗争上来。



很显然，邓小平的做法和论断是极具智慧和科学性的。他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同时又将当今时代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进而指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深刻地揭示了时代的本质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意味着时代主题转换了，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并没有改变。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既具科学性又富时代性，它既指明了当今时代的本质，又改变了时代问题上教条僵化、已经过时的旧表述。

总之，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的科学论断，是包括“时代主题”和“时代本质”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在内的，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时代，就必须将二者结合和统一起来。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定义不同，邓小平创造性地从“时代主题”与“时代本质”两个角度来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时代，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既肯定当今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又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逆转”，这二者为什么并不矛盾呢？因为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并没有脱离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时代，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当前必经的阶段和客观需要。因为本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它们在经济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长期威胁着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主要不是追求“面的扩大”（有更多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要力求“质的提高”，即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用社会主义建设搞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成为“合格的”、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就成了当前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的论断，既坚持了历史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又充分肯定了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既没丢老祖宗，又纠正了某些过时的、脱离实际的旧观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一论述既将当今世界放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看待和把握，又实事求是地指出，这种“取代”和“过渡”不是“指日可待”“急于求成”就可以实现的，而要“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这种“取代”和“过渡”不会是一帆风顺直线式发展的，而是强调“道路是曲折的”；这种“取代”和“过渡”要靠“发展”，而且需要“长过程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必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以社会主义搞成功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总之，当今的和平发展是实现这种“取代”和“过渡”的必由之路。邓小平的这些论断，讲的是“时代本质”，但又不是单纯讲时代的“阶级内容”，而是与20世纪80年代强调的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联系起来讲的。这说明“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是不可割裂和对立的，而是必须结合和统一起来的两个基本问题、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共产党人必须把长远目标与当前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抓紧抓好当前阶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实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大目标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总之，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问题的科学论断，既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

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的路径与选择

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建立和完善有关人口、资源、环境等生态文明的基础性制度体系入手，建立和完善支持生态文明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参与制度。

□ 张云飞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于总体布局，将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来推进。

建立和完善基本的绿色制度。人口、资源、环境是影响绿色化的三个基本变量，建立和完善人口均衡、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绿色化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基础工程。一是建立和完善人口均衡制度。从我国自然条件的生态阈值、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等方面来考虑，必须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促进人们自觉自愿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建设，提高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创新居住制度，引导人口在地理和产业上合理分布，以便防止人口转移带来的自然和社会压力。二是建立和完善资源能源节约制度。从我国人均资源和能源占有量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必须坚持和完善节约资源能源的基本国策。实行资源和能源有偿使用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的作用，注重运用价格、财税、金融手段促进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持科学管理和严格管理，坚决改变各种浪费资源和能源的现象。抓紧制定和修订促进资源和能源节约使用和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制定更加严格的节约资源能源的国家标准，严肃查处各种破坏和浪费资源能源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制度。为了有效治理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必须坚持和完善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

建立和完善绿色化的经济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的经济制度。一是建立和完善绿色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是国家的财产，理应归全民所有，但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是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成效的重要问题，因此，必须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确保国有资源资产保值和增值，防止国有资源资产贬值和流失。二是建立和完善绿色的市场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建立和完善绿色化的文化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的文化制度。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必须软硬兼施，既重视法律等“硬制度”建设，又重视道德等“软制度”建设。一是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生态道德。生态道德是规范和评价人与自然交往的行为准则体系，其基本要求是“爱自然”。超越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抽象对立，既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也在人类中实现自然主义，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生态正义。生态正义是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社会主体在涉及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合理而应当的秩序和状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态正义就是要保证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领域方面的平等权益，在确保大家共同享受自然财富的同时，要具有共同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将生态文明的原则、理念、目标纳入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环节和国民教育的全过程。

建立和完善绿色的社会参与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绿化社会交往制度，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的社会交往制度。生态文明建设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事业，因此，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生态治理的社会参与是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依法治理的统一。一是畅通生态文明领域的信访渠道。目前，许多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而导致的。为此，在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的同时，必须畅通生态文明领域的信访渠道。例如，必须建立健全环境保护举报制度，畅通环境信访、12369环保热线、网络邮箱等信访投诉渠道，鼓励实行有奖举报。二是推动生态文明领域的群众自治。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在生态文明领域推进基层民主就是要推动这一领域的群众自治，在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村委会、居委会和职代会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环境民间组织的作用，促进环境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三是引导公众依法合理维护其生态环境权益。环境权是基本的人权，人民群众有权维护其生态环境权益，但是，环境群体性事件不能成为影响和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必须引导公众依法合理进行环境维权。

专家视点

发展与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 臧雷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上看，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的要求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家战略任务的调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面前，党和人民对于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形之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亟待改进的地方。因此，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将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和现实需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国家治理基础理论重大课题攻关研究。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当代世界发达国家治理理论的有益要素也提供了国家治理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为此，需要凝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优势学科和优势科研资源，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层面和视角出发，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深入总结、提炼阐发和建构发展。同时，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西方当代治理理论进行分析批判，扬弃和吸收，从而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治理理论，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理论知识、分析工具和思维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发挥各类研究智库的优势和特点，从战略层面对于国家治理展开总体发展战略、专项治理和发展战略目标路径、发展阶段、实施机制和贯彻方式的研究。国家治理发展战略研究，是对于国家发展和治理宏观目标和路径的理论思考和概括，也是对于国家治理专项目标及其达成机制的专门概括和设计。国家治理发展战略是理论与对策、制度与政策、宏观与微观、一般与具体有机结合的结合点。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迫切需要展开国家治理和发展战略研究。实践证明，国家治理的成败得失，国家发展的持续壮大，首先取决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战略思考和规划设计。实际上，国家治理的战略，恰恰是国家治理的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国家治理战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类研究智库应侧重于提供针对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方案，智库人才应该是能够把握事物根本、判定事物虚实、敏锐判断社会变化趋势的战略科学家，在其决策建议背后，首先要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论能力和专业能力。换言之，各类智库应该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瞭望者，登高望远，瞭望航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资政咨治的智力支持功能，对国家治理发展发挥战略性前瞻功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基于国家治理和深化改革的现实发展和面临矛盾，从实践出发，对政府、市场、社会治理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系统对策研究。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求立足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提出国家顶层设计方案，也需要统筹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在这其中，主要包含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公共安全治理、腐败治理、司法治理、都市治理、城乡统筹治理、军队治理、“互联网＋”治理和全球治理等。因此，要按照国家治理和深化改革的统一部署，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步骤同步并进，展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制度建设的改革研究，并且深入分析改革与治理的重点难点和深层原因，构成国家治理和深化改革的重大现实使命和对策研究任务。在直面回答和应对这些重大现实问题时，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以及当代中国法治实践提供了什么资源？国外的司法实践具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些课题的研究提出了重大挑战性任务，也迫切需要新型智库组织提供深度理论和对策支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中国地方性行业性改革创新实践进行实时总结评估，并将局部实践上升为地方乃至国家治理的普遍实践。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吸收来自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经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方面有过许多探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方各行业进行过许多创新性实践，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政府绩效管理、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不乏应用推广的价值。然而，许多创新性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及时得以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而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总结地方和行业治理改革的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政策、制度、机制甚至法律。为此，需要组建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对于地方性和行业性实践进行系统搜集、分类整理、实效评估、可推广性分析等研究，从而形成地方和行业治理案例库，为地方治理和国家治理提供服务。

国家治理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课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坚持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用国家治理改革来与国际社会对话，不但可以建立双边或者多边学术文化沟通的渠道，使国际社会与我国学术界更容易达成双向理解，而且可以更大程度彰显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中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艰难曲折的渐进改革而形成的，中国国家秩序的历史进程不仅需要理论解释和说明，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也需要认真梳理和系统总结，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与现状、治理要素和资源做出理论解释和说明，强化我国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国际影响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中国国家治理文明在当代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的重大任务，迫切需要学术性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来承担。